

译介之旅

我为何翻译《西藏的感动》

□意大利·费沃里·皮克

熊育群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西藏的感动》在意大利出版了,它一面世就受到了意大利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这是一部创作于20年前的作品,作者只身去西藏游历与探险,五次大难不死,几乎走遍藏区。他以自己的生死经历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西藏的感动》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怦然心动。

作为一名翻译家,当我决定翻译一部作品时,我首先会考虑它的价值。一部作品的价值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有语言的品质、故事的独特性、作者的思想和对世界的态度以及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选择一部作品,是因为看中了它的内在艺术价值,我特别喜欢有人类学家视野和情怀的作品。熊育群在《西藏的感动》中创造了一个迷人的世界,富有人类学和考古学内涵,作家的人类悲悯情怀渗透于字里行间,通过感人的故事向读者传递温暖,并使读者体验到了纯正的美。

一谈到西藏,外国人就听得出神。他们喜欢神秘,喜欢有异国情调的故事,喜欢发现有关不同文化的一切。熊育群深入藏北无人区,用特别敏感的心灵和一个诗人的感受给我们描写了最原始、最神奇的西藏。绿绿的草原、高高的雪山、蓝色的湖泊、野生的动物……在他的笔下变成了一幅细腻又大气的油画;温柔的羚羊、顺服的牦牛和洁白的羊群,让寒冷而荒凉的高原充满诗意。

我喜欢描写详细的作品。《西藏的感动》中的每个景观都令人着迷,大自然色彩的组合和协调太奇妙了,让人感觉自己处于一个超现实的世界。熊育群描写的人物特别生动,尤其是原始部落的人。藏民是这本书的灵魂,是熊育群创造的生灵。他们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文学的丰富性。

作者写到一个无人地带的山谷。他看见一个男人走出帐篷,这个男人直直地看着他。男人想笑,但却不会笑。原始部落的人长期没有与外界打过交道,所以他们变得毫无表情。这个人身上的每个细节——那树皮一样粗粝的脸、那蓬乱的头发与两个小辫子、破烂的衣服和羊皮……仿佛就在我眼前。

作品中所描写的荒原上的淘金者和尼泊尔的背夫,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个性鲜明,像是神话中的传奇人物。体力劳动和贫困艰苦的生活令他们富有感染力。

作者给我们描述念经作法的密宗法师,他们可怕



《西藏的感动》意文版

的面具、古老的仪式,还有藏族人对死亡、对葬礼和灵魂的观念,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翻译工作,也是一种对于宗教与生命的探究。

这部作品还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我们能感觉到藏族人的宗教信仰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信佛,相信来生,愿意过着艰难的日子:不怕苦,不怕穷,不怕孤独,也不问自己什么叫幸福。藏族人生一无所有,但他们却拥有天生的快乐。我们在大城市里什么也不缺,却几乎已经没有快乐的能力。草原上的流浪者忍受着漫长的寂寞,可他们却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心灵的平静。这样的人物很优美,他们让我想起我书中的人物,我热爱的少数民族,我描写的人物同样十分淳朴和真实。

人生真能苦尽甘来吗?转山的朝圣者在岗仁波齐上淋着雨雪,一群一群从作者身边走过,这让他想起遥远的中世纪。他们十几天甚至大半个月没吃东西,有七八岁的孩子,也有背已很弯的老人。因为心中有佛,尽管经历过非人的长途跋涉之苦,他们脸上的表情仍是友善而亲切的,放射着光芒。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到他们的情感和痛苦,无法不受到感动。

熊育群渴望流浪远方的强烈内心需求也使读者感受到他的冒险精神,还有那自由的感觉,来自心灵深处的寻找快乐与平静的愿望。怎样获得幸福并生活在和平与宁静中,人类真正需要什么?作者在书中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引导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

这部作品还是一部长篇历史作品,它给我们介绍神秘的古格王国。这个古老王国的遗址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壁画、佛像、建筑还保存得那么完好,作者对这些宝物的描述令人陶醉。特别是写到一个以红色为主调的壁画:这是一个巨大的画像,只能看到一双巨爪压在莲花台上,中央掉下一串彩珠,边上绘有小佛像,而巨兽已被时间褪色,看不清它的真容。这个壁画很有感染力而充满神秘感,就像古格王国的灭亡之谜。在一片奇异的土地上,一个富饶而繁荣的王国突然消失在虚无之中。我认为有必要让西方人知道这个古国的历史和存在。

通过这本书,熊育群讲述了生命和大自然的奇迹,还有历史、艺术和宗教的魅力。这部作品是许多知识的珍贵源泉。它不仅向我们打开了宏大的文化窗口,也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的本质、感情和内心世界。

对外翻译与出版:

应从粗放转向精准

□黄卓越

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强烈的现代性与“面向世界”的诉求,人们热衷于翻译、引进各类西方著作,这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身文化的外传,由此造成了“内传”与“外传”之间的严重失衡,也可以说是文化上的“逆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经济领域开始大步走向海外,而文化的对外传播则长期踟躇不前。当然这种情况也在改变之中,尤其是前些年对“软实力”、“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等的讨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宏大理念的提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界的文化外传意识。大约自2012年始,这一步伐开始急速加大,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我以为,在其中出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被动输出到主动传译。从总体上看,过去的中国文化、文学等的外译基本上有赖于少数熟悉汉语的国外专家的个人选择,国内在这方面的作为则很少,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各界从政府到企业、民间的主动性均大大加强,介入的群体越来越多,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外推效应。二是模式上的创新。这是指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边运行的简陋模式,而出现了中外积极合作的多样化的运行模式。这首先是指中外合作翻译与出版渠道的共建,譬如许多国内的出版社都与国外的相关机构联手成立了中国主题图书编辑室、期刊编辑部,甚至通过收购的方式,将国外的出版社纳入囊中,以便直接将外译的出版物推送到海外市场,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国书屋”、“中国书架”也纷纷在海外顺利落地;再就是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如每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重大活动期间组织翻译与出版、影视合作等方面的研修班,将世界各地的相关专家邀请到中国来,了解中国文化出版与影视等的情况,拓宽合作的机遇,收到了许多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为进一步的则有“外国人写中国”计划等,这项计划的开展,主要还是考虑到由各国的人士自己撰写的对中国的认知与体验,其传播的效果常常会比翻译书籍更佳,目前这一工作既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委托中国文化译研网的项目,也有“驻地写作”等模式。三是翻译与出版的语种上有了极大的扩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囿于少数几个大的语种,而是扩大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语种,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翻译在今年有了急剧的增加,例如在日文与葡文翻译与出版中,过去我们接触很少的拉美地区也开始将视线移向中国作品。四是中译外的品种或类型也在大幅度扩展,而不是限于过去着眼比较

多的哲学、文学等领域,当前的外译也覆盖了当代政治、经济、农业、科技、社会科学、儿童读物、汉语教材等。这是因为国外的精英很希望了解中国这些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原因在哪里,中国在未来究竟能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译者则对农业种植、灌溉等书籍很感兴趣,这与他们的实际需求是密切相关的。第五,通俗读物的外译相比过去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网络翻译也相当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大众阅读”时代的到来是有密切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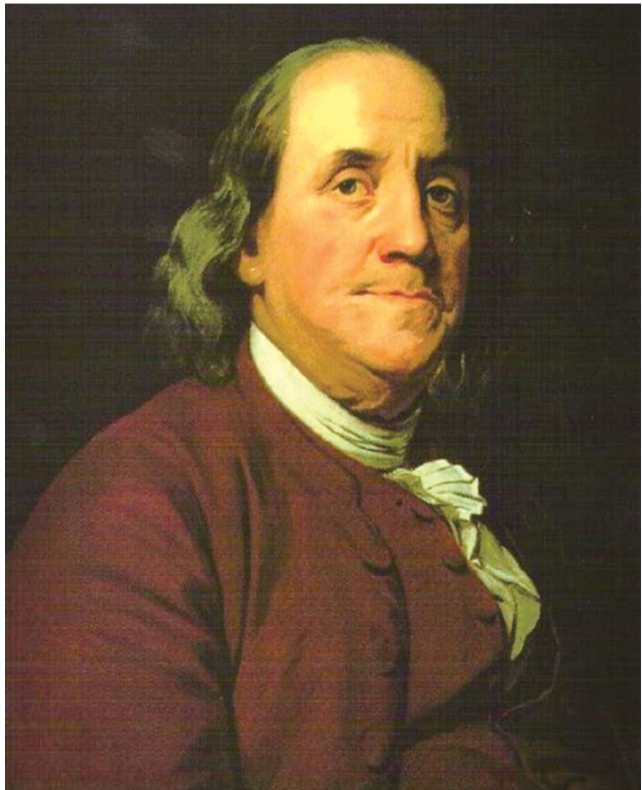
尽管各界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倒灌”式的局面,但根据一些国外对出版物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文化、文学的外译与出版在国际上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小。原因有很多,无法一言而尽。就我自己的观察,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国外出版情况以及传播流程等还不是很清楚,譬如哪些出版机构有真正传播实力的,哪些译者更是更为专业的、投放与宣传的着力点应当在哪里等,目前我们只是了解很小一个部分,这也造成外译或合作时的误差。二是对国外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接受需求不太熟悉,毕竟“海外”只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不同国家、区域的阅读趣味还是有区别的。三是优秀翻译人才的匮乏,近来我们的出版与翻译界尽管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让所在国的译者来承担中文外译的主要任务,但国外出版机制造成了许多谙悉汉语与中国文化的专家不太愿意从事翻译工作,有些年轻汉学家尽管热情比较高,但要真正成熟起来还有待时日。四是在宣传口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口号,在对外使用时则容易引起误解,会凭空增添一些阻力,许多外国人对一些带有中国主体性措辞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在对外宣传时务必要有所斟酌,要传达出他们更易接受的信息,要告诉他们,我们所从事的不是单纯的“文化输出”,而是多元文化的互享与互鉴,以及维持全球在文化生态上的平衡等等。

进一步加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大致而言,就是将粗放式的外推转变为更为精准的外传;进一步摸清国外的传播流程与受众心理,从信息上的“隔”走向“不隔”;不仅是自己来做,更要积极调动海外人士的积极性,让他们更为主动地参与进来。

毕竟,我们的对外翻译与出版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不久,真正的尝试算起来还只有几年的时间,迈出的步伐已经算是相当之大了,因此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调整策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战略的持续性、节奏性。长期努力下去,就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

□杨 靖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政治家、科学家,也是一流的外交家和军事家。然而这位18世纪启蒙文化巨匠在致友人书信中却坦承:他平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作家(author)。在长达60余年的社会活动中,有一件事据说最令他耿耿于怀——大陆会议遴选托马斯·杰弗逊为主要执笔人负责起草《独立宣言》(富兰克林仅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理由是,与会人员普遍担心“富兰克林会在《独立宣言》中某个地方埋下一个冷笑话”,从而影响了文件的严肃性。其实换个角度看,这一事例恰恰说明,富兰克林作为幽默作家,其声望已是举世公认。

富兰克林一生著述颇丰。美国学者罗伯特·斯皮勒对富兰克林的文学创作(包括书信、随笔)评价很高,他认为:“在富兰克林一生的经历中,他的著作与他的事业相得益彰。”——富兰克林论述科学的小册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伦敦及巴黎的知识界聚会上经常被诵读。富兰克林讽刺英国愚蠢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文章嬉笑怒骂、妙语连珠,完全可与斯威夫特或伏尔泰的政治讽刺诗文相提并论。富兰克林的创作不仅题材宽泛,而且风格多变——如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卡姆斯勋爵与戴维·哈特利的信件态度庄重而认真,但是写给大西洋两岸年轻女士的迷人短笺却充满语气轻佻而且不逾矩的忠告。时至晚年,富兰克林生活中轻松愉快的一面也最具吸引力——其书信体散文《巴加特勒》《富兰克林与古特之对话》《哨子》等令人爱不释手——“在这些书信体散文里反讽升华成了奇想,对于生活喜剧式的钟爱成为深邃智慧的源泉。”然而,遗憾的是,富兰克林的幽默逗笑却经常因为编选教材者

的道貌岸然而难以传诸于世。

尽管富兰克林的写作并不以文学性见长,但他的文风朴实无华且富于幽默色彩,在美国18世纪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在他的代表性著述中,除了以教育后代青年为目的的《自传》,还有影响巨大的《穷理查年鉴》。《自传》叙述了富兰克林的家庭身世、青少年时期自学和工作情况、1757年以前他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在政治、经济、科学方面的成就。全书反映了作者在自学、创业、研究、斗争等方面所表现的为进步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被认为是“自我教育的光辉范例”,它对美国民众的人生观、道德观、事业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富兰克林启发了18世纪美国人的道德伦理,帮助他们走向民主之路。他的伦理道德思想,照马库斯·韦伯的说法,不仅影响了美国人,更进而带动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因此,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评价说:“富兰克林不单是属于美国的,他是属于全世界的。”

与《自传》的出发点相同,《穷理查年鉴》的编撰也是出于教育民众的目的,并且更多滑稽幽默的色彩。“我尽力使它既有娱乐性又富于教益”,他后来回忆说,“因此,我把日历上值得注意的那些日子中间留下的小小空白都填上了谚语,其中主要是有关既让人们获取财富、又让他们保持美德的那些劝导人们勤劳节俭的内容,让那些贫穷的人们总是老老实实地行事比较困难,就像让一条空口袋竖起来一样。”这些格言警句,如“言多必失”;“享乐耗心智”;“不懂的事别做”;“羡慕是无知的女儿”;“一条狗逮不住两只兔子”;“谦卑给伟人带来双倍的名声”;“鱼和客人到第三天都会变臭”;“小的漏洞会使一条大船沉没”以及“要想说服别人,与其讲道理不如谈利益”;“他对你句句赞赏,你对他不可不防”;“找朋友要慢,换朋友更要慢”;“穷困、诗歌和新头衔,都能让人发疯”;“要是你想得到很多,很多就会变成很少”;“蚂蚁不布道,只顾向前行”;“勤勉可以还清债务,而绝望只会使债台高筑”;“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半闭眼睛”等,大多言简意赅而滑稽风趣,可以说是浓缩了美国移民社会的生活哲学,不仅能为家庭阅读提供足够的材料,也能为人们提供生活指导。在这些著述中,富兰克林毫不吝啬自己的实用主义写作观,他说:“如果作者为某类读者而写作,他所采用的形式和方法必须适应这些读者的特殊口味”。

独立战争期间,富兰克林也写过一些充满机智警句和激烈讽刺的随笔,比如《将一个大帝帝国变小的法则》和《普鲁士皇帝的法令》等。这些文章运用斯威夫特的反讽和笛福的夸张等文学手法,揭示英国人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值得一提的是,富兰克林在创作中形成了“用谦逊的词汇表达自我的习惯”,这类自我贬低式人物是美国幽默史上最受欢迎的形象之一。富兰克林将此作为自我保护的屏障,同时也赢得了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美国读者的普遍认同。曾与富兰克林一道出任驻法公使的约翰·亚当斯总结说:“富兰克林善于讽刺和挖苦,他喜欢贺拉斯、斯威夫特或拉伯雷。他有反讽、讽喻和寓言的天赋,他能运用出色的技巧促进道德和实践性真理的发展。”——事实上,被视为富兰克林讽刺性代表作的《出售雇

佣兵》最能体现这一技巧。书中描写一名贪婪的德国伯爵,听到他输送到北美的军队在特兰顿战役中遭遇大屠杀时,居然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他即将又有一笔大买卖。在这里,富兰克林将斯威夫特“一个小小的建议”中的反讽策略与美国荒诞故事中的极度夸张结合起来,使其中的幽默具备了浓郁的美国元素和美国特色(日后马克·吐温等作家也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

作为作家的富兰克林,其写作习惯是凡事必有文字记载。他将电学研究的杰出成果写成论文,寄呈英国皇家学会,令一向倨傲的英国人对殖民地的科学成就刮目相看。对于他发明的新式火炉、避雷针,以及双焦距眼镜等新鲜事物,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写出科普文章,介绍其功用。他于1763年发明的玻璃琴,是一组放置于水平纺锤中的玻璃器皿,通过演奏者的脚踏板使纺锤中充满水,再经由手指精巧的摩擦而发出声音。这种名为“哈摩尼”琴的乐器是现代钢琴的原型,在欧洲风行一时,据说连法国国王后安托瓦内特也倾心不已。而富兰克林自我推销的广告软文,亦为之增色不少。

除了科学著述,富兰克林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多有发明,比如他最早提出人口学理论。众所周知,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名预言是食物增长的“算术级”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几何级”增长;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理论实际上深受富兰克林的影响。富兰克林通过对17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北美人口增长的研究,发现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当时地球上最快的——每20年增加一倍——并将在一个世纪内超过英国;他同时强调人口的增长最终将取决于粮食的供应。富兰克林将其研究成果匿名在波士顿出版,很快在英国翻印,亚当·斯密及马尔萨斯对他的研究成果十分感兴趣,并将其研究成果吸纳到各自的著述当中。

同样,时常被忽略的还有富兰克林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创新与发明。1723年,宾夕法尼亚首次发行纸币。1726年,部分纸币被收回,市场上货币缺乏。货币问题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相当尖锐的问题。富兰克林赞成增发纸币,并确信增发纸币大有好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的辩论,使我对于这一题目感到很大的兴趣,我撰写和发表了一本不具名的小册子,名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富兰克林在书中指出,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必定有数量均衡的货币。多于或少于这个数量,对于贸易都毫无益处。然后,他进一步探讨,大量增发纸币是否会使其的价值大幅度降低。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必须首先讨论关于一般货币的性质和价值的正确概念”——就是在这一部分,他阐发了劳动价值理论。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受到普通老百姓的欢迎,但遭到有钱人的反对。最后议会终于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增发纸币的议案。

不仅如此,富兰克林在1769年出版的《关于国民财富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也试图从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历史地论证他的劳动价值论,解析价值的构成,并说明利润的来源。其中特别提倡勤劳致富——他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鼓励和保护任何形式的

勤劳;应该使用一切可能的的方法根除懒惰”。因为游手好闲是一种“没有补偿的消耗”。他倡导家庭妇女把家务劳动之余的零碎时间利用起来。一年的零碎时间的总和,对于单个家庭,乃至相应地对于整个国家都是非常可观的。他的格言是:“丧失时间就是丧失生计,因而也就是丧失财富。”这也是“时间就是金钱”这一格言的最早出处。对此,马克思曾评价说:“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几乎看出了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的价值用劳动来估量是最正确的。’马克思非常赞赏富兰克林对价值的这种深刻见解,称之为‘一种萌芽状态的劳动二重性的观点’。马克思本人并将其作为一种非常有创见的观点在《资本论》中加以引用与评述。”

除此以外,富兰克林的主要作品还包括《移民美洲须知》以及《评北美洲野蛮人》。他用《移民美洲须知》这本书来向全欧洲介绍美国的真实情况,并对欧洲人妄自尊大的错误观点加以驳斥。“那都是漫无边际的想象……真实的情况是,尽管那个国家的人民很少有像欧洲的穷人那么贫困潦倒,也有极少的在欧洲称为富人的人……美国是一块劳动的土地,任何人在那里都不可能不劳而获。”另外,针对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偏见,他写下讽刺辛辣的《评北美洲野蛮人》:“我们称他们野蛮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自己的是文明的,美好的;而他们认为自己的同样如此……没有暴力,没有监狱,没有官员去强迫服从或惩罚。印第安妇女耕种土地,准备饮食、照顾和抚养孩子,保存并向后代传授记忆下来的公共事务处理方法。这些男人和妇女所从事的活动都从自然出发……和他们相比,我们的劳累的生活方式,被他们视为卑贱和低下的;我们自己珍视的学识,他们看作是轻浮和无用的。”最后他说:“如果我们不偏不倚地审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将发现没有一个民族是粗野得没有任何礼貌规范,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彬彬有礼得没有一点粗野的残余。”与富兰克林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据此宣称,富兰克林是当时“最伟大的文人”,因为他悲悯的情怀和高贵的人性超越了种族、肤色和地域。

对于富兰克林的创作生涯,美国著名批评家艾伯拉姆斯精辟地指出:“我们时代的所有文人中,在高雅以及哲理的精确和观察的深度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是首屈一指的。他所论述的每一个课题,在他的笔下,都以别人更新颖、更吸引人的面目出现。政治、宗教、科学,这些历来都是枯燥无味的学科,他可以通过道德寓言和传说寓教于乐,品味高雅。”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富兰克林还是第一位公开为“市场化写作”辩护的作家(他认为写作既不是布道式的道德说教,也不是革命中的舆论工具)——在他看来,写作不仅要表达自我,也要面向大众,从而赢得市场的认可。美国学者杰克逊·威尔逊在近著《修辞:美国作家与文学市场,从富兰克林到艾米莉·狄金森》一书中,将富兰克林定义为美国革命前后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职业作家”(author by profession),可谓得其所哉。